

风雨南洋行



丁波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宣揚文化

中國歌舞劇藝術社

開週年紀念

卅七年八月

徐悲鴻



為人民服務是今天一切工作的總目



市反封反官僚資本是為人民服務的總
路線，我們站在藝術的崗位，應該竭
力遵循這個總路線，以達到這個總
目標。敬請同志們共同努力。

中國歌舞劇藝術社
卅七年八月

丁波

丁 波著

风雨南洋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在曼谷主办夏令歌咏班开学
礼时全团师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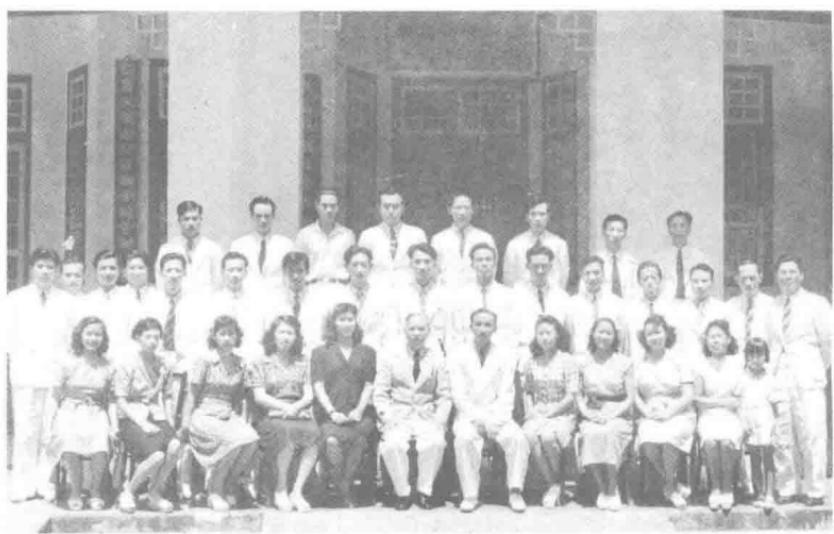
华（右八）吴錦麟（右九）

丁波（右六）赵汎（右七）程季

影。前排右第五人起为吴盛育、
乐系学生与校董、校长、教员合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中艺」
社长丁波（前左六）舞蹈编导梁
伦（前左七）陈蕴仪（前左八）
参加暹华舞蹈艺术研究会成立茶
会留影





1947年8月“中艺”到达新加坡拜会陈嘉庚先生时留影



“中艺”全体社员1948年8月在槟城合影



舞蹈《缅甸情歌》一场面



独幕剧《风雨三条石》剧照



舞蹈《马车夫之恋》



话剧《海外寻夫》中的四个女性人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歌剧《儿女英雄》(农村曲) 剧照



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在曼谷演出剧照 1946年12月



独幕剧《风波亭》剧照

“中国歌舞剧艺社” 南洋演出四十周年

(代序)

夏衍

“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的前身是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在武汉组织的抗敌演剧队第5队和第7队。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5、7两队来到广州，国民党反动派为准备进攻解放区，正疯狂地在各地镇压民主运动，迫害并逮捕民主人士。5、7两队的行动也受到监视，演出活动被禁止，全队领导骨干，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恩来同志得知了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指示两队“相机撤退”。

1946年秋，两队的绝大部分同志，分期分批撤至香港。当时，我正在香港，经中共香港工委研究，支持他们成立一个职业艺术团体，到南洋各地去巡回演出，向广大华侨、华人宣传祖国文化艺术和八年抗战取得伟大胜利的业绩。当时，我曾对这些同志说过：“你们到

目 录

“中国歌舞剧艺社”南洋演出四十周年(代序).....	夏衍(1)
1. “相机撤退”.....	(1)
2. 初到香港.....	(5)
3. 演出的探索.....	(10)
4. 期待的日子.....	(16)
5. 签订了《出国公约》.....	(19)
6. 跨海穿云去曼谷.....	(23)
7. 亲切的欢迎会.....	(27)
8. 第一炮打响了!.....	(31)
9. 在大使馆里.....	(34)
10. 《儿女英雄》定乾坤.....	(37)
11. 战胜了“新唐病”.....	(40)
12. 完成了八十四场.....	(41)
13. 拨开了云雾.....	(44)
14. 戴上了大红花.....	(47)
15. 难得的享受.....	(50)
16. 艺术种籽发芽、开花了.....	(55)
17. “中国艺术家真聪明”.....	(57)

18. 《生产三部曲》引起的风波	(59)
19. 再见，曼谷！	(62)
20. 到了新加坡	(64)
21. 必要的“拜码头”	(67)
22. 成功的首演	(72)
23. “双十”演出的风险	(76)
24. 一举多得的郊游	(80)
25. 到“大西洋”去！	(83)
26. 《糊涂县长》引起的风波	(86)
27. 喜事新办	(88)
28. 办起了“中华艺专”	(92)
29. 吉隆坡的恶浪	(96)
30. 在吉隆坡外围	(104)
31. 怡保的怀念	(107)
32. 太平，真不太平！	(111)
33. “紧急法令”的妖风	(113)
34. 来到了“自由港”	(115)
35. 两场虚惊	(118)
36. 愁喜交集的日子	(121)
37. 槟城寄女	(123)
38. 《海外寻夫》及其他	(127)
39. 双重的纪念	(131)
40. 再见，槟城的朋友！	(135)
41. 重返新加坡	(142)
42. 再次面临“限期离境”	(144)
43. 二访陈嘉庚先生	(148)

44. 告别陈嘉庚先生.....	(150)
45. 怅惘别星洲.....	(153)
46. 香港的下马威.....	(156)
47. 香港的暖流.....	(160)
48. 上了一次革命大学.....	(162)
49. 实际得来的法宝.....	(164)
50. 向周副主席汇报.....	(167)
51. 重登香港舞台.....	(171)
后记.....	(174)

1. “相机撤退”

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有了第二次合作。陈诚、周恩来分别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正副主任，下设以郭沫若为首的第三厅，负责领导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秋，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南京失守，武汉成了抗战的心脏。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各地的大批文艺青年，像滚雪球一样地来到武汉，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到前线，到农村去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鼓舞士气，唤起民众。

经过周恩来同志耐心反复地和国民党方面交涉，才把这些热血文艺青年组成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直接由第三厅领导。武汉撤退前夕，匆匆将各队分配到各个战区活动，其中“演剧5队（原9队）”，转战湖南、广西、云南、缅甸的前线和后方广大农村；“演剧7队（原抗宣1队）”，八年来在广东、广西，走遍了大小城市和农村。这些风华正茂的赤子，露宿风餐，爬山涉水，不顾战火纷飞，忘记一切艰险，坚持写抗战读物，演抗战戏，唱抗战歌，画抗战画。经过八年的艰苦磨炼，不断学习，终于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有觉悟的文艺队伍。

1945年，抗战胜利了，庆祝的鞭炮，响遍了全国的城市、农

村。流离失所的难民，扶老携幼，拍干净身上的泥尘、血污，带着喜悦的心情，拖着疲惫的步子，向自己的家园走去。我们演剧队的青年，把 8 年的艰辛一古脑儿抛在九霄云外，庆幸自己的年华没有白费，盼在今后建设祖国的日子里，实现更大的理想，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第 5、第 7 两个演剧队，欢欣鼓舞，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广州，我们真心实意地在这个光复了的大城市，以唱歌、演戏与各界同胞见面。我们先后在“民众会堂”（现在的“南方剧院”）演出了自己创作的话剧《艳芳酒家》、《胜利财》，冼星海的作品《黄河大合唱》和著名的针砭时弊的歌曲《古怪歌》、《茶馆小调》，以唤醒民众争取民主，争取自由。这些节目的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却触痛了反动派的神经。国民党当时驻广州行营政治部主任黄珍吾，抖起他那特务头子十三太保的威风，在戏院门前竖起了一块“勒令停演”的大木牌，使我们不得不向前来看戏的观众表示道歉，并宣布退票。可是上千的观众，怒目切齿，站在戏院门口不走，大声疾呼：“我们要看戏！”“我们不退票！”我们的戏在城里被禁演了，可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却邀请我们到校内体育馆演出，还要两队帮助他们排戏、练歌，举行座谈，这样我们就和中山大学的进步同学交上了知心朋友。

黄珍吾和他的狗腿们，看在眼里，怒在心上，一计不成，再施一计，变本加厉地逼迫我们。他开始在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会上，指桑骂槐，污蔑共产党，继而凶相毕露地狂叫，说两队中有共产党。记得有一次，他命令两队集合，先是声嘶力竭地训斥一顿，接着追问谁是共产党，他还一个个地指着鼻子问：“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威逼不成，他又利诱说：“还是自己交待好。交待出来，有赏！”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最后竟传讯

扣押了两队的队长和副队。

国民党反动派大批美式装备军队，纷纷从广州调集到东北，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演剧两队的处境越来越艰险，两队的骨干随时有被捕或失踪的可能。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左洪涛同志——当时任国民党驻广州行营长官部副官处长，实际上代表地下党领导着这两个演剧队——心急如焚，迂回曲折找到了正在广州与国民党谈判的廖承志同志。廖承志同志说：“事关重要，须向周恩来同志请示决策。”这时周恩来同志正在上海与国民党谈判，左洪涛同志委托当时以伪行营军法总监身分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吴仲禧（解放后任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同志持密信飞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周恩来同志当即批示：“相机撤退”。

这四个字，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绝不能做任人围歼、宰割的牲畜，我们要继续战斗。为了两队的安全，同时又要考虑到不致影响尚在大后方的各兄弟队的安全，左洪涛同志与中共香港工委饶彰风同志仔细研究后，决定采取合法复员的办法，在两队中挑选一部分精干人员，在自愿的原则下，撤到香港，组织一个艺术团到南洋去，其余的队员另作妥善安排。

集体复员，十三太保黄珍吾是绝不会同意的。于是我们决定利用地方军阀张发奎与蒋介石嫡系黄珍吾之间的矛盾，由全体队员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只向张发奎写信，有的说要男婚女嫁，有的说要升学读书，有的说要另谋职业养父母，有的说要治病……。同时委托在行营有一定影响的上层进步人士，特别是张发奎的亲近和平时同情演剧队的幕僚，如高级参谋、行营办公厅主任高若愚，军法执行总监吴仲禧等，向张发奎进言。张发奎深知黄珍吾平时对这批青年的压制，同情他们的处

境，表示同意全体复员，并保证好来好去，不伤害任何一个人。

第三天，两队队长带着集体复员的报告，由左洪涛带领去见张发奎，并说明黄珍吾是不会同意两队复员的。这一粒火星，点燃了张发奎的怒火，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批准两队复员！发给复员费！安排聚餐！开个告别晚会！”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我们一面整理行装，一面以张发奎的名义，筹备举行一次公开的“告别晚会”。黄珍吾知道了这个消息，气急败坏，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

告别晚会的主要节目是朗诵《面幕颂》这首长达800多行的诗。在朗诵的1个小时中，台上有愤怒，有眼泪，有欢笑，也有悲戚；台下有高声喝采，有低声饮泣，也有感叹唏嘘。张发奎注目谛听，表情随之起伏，时而交头接耳，时而左右互相应和。唯有黄珍吾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突然站起身来，走到张发奎面前：“报告长官！你批准他们复员，我黄某……”没待他说完，张发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黄珍吾不敢往下说了。张发奎转守为攻，理直气壮地质问：“怎么样？你不赞成他们复员，是不是？”论官阶，这个特务头子毕竟是下级，他只得暂时忍受这瓢浇头冷水。

演出结束，张发奎和其他官僚陆续退场，黄珍吾像斗牛场上出阵的公牛，气呼呼地命令全体演剧队员集合，气急败坏地吼叫：“你们想复员？告诉你们，没有南京总政治部的批准，谁也休想走！只要我黄某在位一天，你们就走不了！”说完，头一扬，对着他的副官说：“马副官，给我向南京挂个电话，告诉他们，我明天即飞南京汇报。”他还耀武扬威地耍着流氓腔调补充说：“南京总政治部听我的，绝不听别的什么人。”这“别的什么

人”，当然是指张发奎。

第二天，他临行前，嘱咐他的副官打电话通知两队：“主任从南京回来之前，不许轻举妄动。”

据左洪涛等地下党领导分析，黄珍吾此行，绝不是单纯汇报演剧队复员问题，更大的目标是要在演剧队里抓出共产党，从而给张发奎戴上一顶“亲共”的帽子，好把张搞掉。这样以来，估计三几天黄珍吾就能回来。于是我们布置演剧队全体人员必须在三天内撤离完毕。

两个演剧队，共有60多人，需要撤到香港的40多人，其余有的到外省，有的隐蔽在广州的亲友家中。去香港的各自购买火车票，分头上车，沿途不许互相招呼，到达香港后在指定地点集合。所有演出器材、公物，也都在深夜运到了指定地点。

黄珍吾太自信了。第四天他一回到广州，就兴师动众地去捉拿“瓮中之鳖”。当狗腿们扬着那张“改编演剧队”的空文到达两队住地时，只有一块旧招牌和散落在地上的废纸、破麻袋。黄珍吾见此情景，声嘶力竭地叫嚷：“你们全是草包！饭桶！几个唱戏的也看管不住！……”

我们认真执行了周恩来同志“相机撤退”的英明指示，保存了实力。我们胜利了！

2. 初到香港

接到撤离通知后，演剧队内喜气洋洋。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白天佯装若无其事，深夜却用被单遮蔽门窗，分工负责整理公物，收拾行李。6月的广州，气温已经高达30多摄氏度，

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因为大家都怀着这样的心愿：冲破密布的乌云，迎接美好的明天。

第二天，从清晨开始，同志们互道“再见”之后，拿着最简单的行李，分头悄然从米市街、仓前街走向广九火车站，夹杂在广大的旅客当中。汽笛鸣响后，火车头像负重的老牛喘着粗气向前蠕行。队员们吁出憋了很久的窝囊气，不禁暗叫了一声“广州，再见！”同时，他们心头又都涌起一阵失落感：这次撤退，毕竟是离开孕育自己成长的祖国啊！多难的同胞还在水深火热中！我们日夜憧憬的理想，倚门盼望的亲人……啊！我们不告而别了……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这种复杂的心情还是第一次产生。

恶劣的环境，不容许你欢欣、歌唱，你必须提防车厢前后有没有跟踪的特务。大家巴不得早点平安到达香港。可你越心急，火车偏走得更慢，大小站都要停留十几二十分钟，甚至更长。约200公里的路程，大约走了6个多小时才到九龙尖沙咀火车站。远远看见先几天出发打前站的黄力丁、胡振表，就像看见久别的亲兄弟一样，下了车，握手、拥抱，边道离情边落下激动的热泪，以致忘了出站台。可谁知道我们这批幸运的流浪儿才离别不过三天哩。这三天，对我们来说，确实太长了！

两位打前站的同志领着大伙到九龙大埔道的一间停业的小工厂里。他们早已用布幔把一间约90平方米的车间隔成了3个小间，两边分别为男女同志的寝室，中间一间当着大门，作集合、接待和排练之用，还租用了一个“阁仔”^{*}，是领导研讨工

• “阁仔”：广州话。即阁楼。

作的地方。就这样的物质条件，同志们都感慨万分地说，太美了，比起演剧队七八年在战地、在农村，住庙宇、祠堂，垫稻草好多了！打前站的同志还为我们每人买了一张行军床，大家躺下试试，都说：“太幸福了！”

提起“幸福”，有人讲了个小故事：1939年，徐特立同志在桂林，有记者问他一生中感受到的最大幸福是什么，他诙谐地回答：“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小块干地，躺下来休息了1小时，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享受。”我们今天有房子住，有行军床睡，可以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个夜晚，对我们演剧队员来说，当然是一种最大的幸福了。

初到这神秘的香港，很多同志都想去领略一番，或者去看看自己的亲友，或者去游览市场。到街上一看，五花八门，样样都有，价钱也不贵，只是谁也没有港币，只好望而兴叹。后来，领导小组决定从复员费中抽出一点港钞，每人发给3元。同志们捧着这区区小数，却如天上掉下黄金一般宝贵，虽然实际上买不到多少东西，可心里却是甜滋滋的。

战后一年多的香港，虽然正在恢复中，但仍有许多荒废倾圮的残迹，尤其是九龙，更显得破旧、凋零。一些无业者小偷小摸，甚至以抢劫为生。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自由组合编成小组外出观光，并约定几条不成文的规则。同志们像出笼的鸟雀一样，有的去青山道，有的去九龙城，有的过海去港岛。玩了一天，晚饭前，十来个小组，都陆续返回。有人兴奋，有人失望；有的还见了文艺界的老朋友，说他们对生活非常忧虑。看见大街小巷张帖的告示，看见那些层出不穷的抢劫、强奸案件报道，大家知道这里和内地一样没有安全保障。但见到处处有海报，宣传苏联电影《政府委员》、《乡村女教师》、《西